

# 历史叙事主体化与总体性史诗的生成演进

## ——从《故事新编》到历史穿越小说

王 姝

**内容提要** 五四以来历史叙事的主体化，经历了以《故事新编》为代表的现代历史短篇，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史诗长篇，与以《临高启明》为代表的历史穿越小说三个阶段。现代历史小说以现在时态讲述历史故事，叙事主体追求多元历史的诗意；当代历史长篇在反映历史总体性规律目的下以叙事主体的自觉选择，完成了文化冲突与历史理性的深刻反思；网络众筹写作使历史穿越小说的主体变成了众多网友的真实肉身，通过多重主体的合作书写，展开了历史丰富的褶皱，但问题和弊端也显而易见。这些都为未来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可资参鉴和反思的参照，以及建构主流话语历史叙事的契机。

**关键词** 《故事新编》；《李自成》；《临高启明》；历史叙事主体化；总体性史诗

### 一 现在时态下的历史叙事主体化

历史小说只有自五四以来，才成为现代的文體。与传统演义历史小说相较，最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历史叙事从“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循环历史观的道德教化下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历史叙事的主体。在演义式历史观下，所有人物的行动都有前世的命定，都是天命循环的施行者，悲欢离合、是非成败仅是天命的实现。五四以来的历史小说，通过历史叙事主体化打破了天命循环的历史观，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空间中被释放出来，历史小说的主人公第一次成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人，从而开启了历史小说现代转型的旅途。黑格尔曾说过：“历史的事物只有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时，或是只有在我们可以把现在看作过去事件的结果，而所表现的人物或事迹在这些过去事件的连锁中，形成主要的一环时”，“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sup>[1]</sup>。只有当所叙述的历史发生鲜明的现实指涉时，它才能融入时代精神，融入到历史叙事中，形成历史文学所特有

的美感——历史感。历史感是历史文学独具的诗意品格，它表现为现实与历史的水乳交融。历史穿越时空，现身于现实人间，用浓厚的人生底蕴，去映照现实的悲欢离合，由此实现历史叙事的主体化。

要实现历史叙事的主体化，现代历史小说运用了多样的艺术手段。首先是用现在时态的历史叙事营构了“追忆着的现代时”这一特殊的历史氛围。以现代历史小说的经典代表，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故事新编》第一篇《补天》的开头是这样的：

女娲忽然醒来了。

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sup>[2]</sup>

撇去女娲这一特殊的名字不看，整段叙事完全是现在时态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刚刚从梦中醒来的人，懊恼而无力的精神状态。其后紧跟着，小说以女娲之眼观察打量周围的事物，便看到“石绿色的浮云”“忽明忽灭”地眨着眼的星星等诸般充满了情感隐喻的景物。《铸剑》的开头则是：“眉间尺刚和他的母亲睡下，老鼠便出来咬锅盖，使他听得

发烦。”<sup>[3]</sup>《奔月》以羿的马疲惫归家开头,《出关》的开头是老子呆坐,学生向他通报孔子来访,《理水》开头描写百姓在洪水中的情形,《故事新编》所有篇目都是这样直接以现在时态切入历史情境的写法。如果不是这些特定的历史人物,无法判断小说所写所述,实为历史故事。这些历史人物在现在时态的生活情境中,或闷坐无端,或疲倦失落,遭遇着各种各样的猜疑、质问与争吵的无厘头状况。以此现在时态,历史叙事中的历史人物,接通了现代生活。他们虽为古人,却与现代人并无二致,一样思考着,行动着,爱恨生死地活着。

历史人物由此上升为“现在”的主体。《故事新编》中的历史主人公们,最突出的心理状态就是“无聊”。女娲在无聊中开始造人、补天;羿无猛兽可射感到无聊;眉间尺被无聊的干瘪脸少年缠住,遭遇无聊的看客,王也因为无聊才有了以头相搏的看戏,结尾的出殡更是一场无聊大游行;禹爷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终于满足了看客们的无聊。所有的故事之外,还套着一个故事,那便是鲁迅在无聊中嘴角挂着的一丝嘲讽的笑。当鲁迅用《故事新编》挖掘中华民族的原典文明,做着文化上的寻根努力时,发现女娲、羿、禹所有的英雄都遭遇了“无聊”。鲁迅就这样将现实遭遇和切身感受写进了历史小说。

《故事新编》共有8篇,写作时间从1922年起至1935年止,历时13年。其中《补天》《奔月》《铸剑》3篇属于前期作品。《补天》完稿于1922年11月,发表于1922年12月1日北京《晨报四周纪念增刊》,题名《不周山》,曾收入《呐喊》。除《补天》外,《呐喊》集中最晚篇目《社戏》等均写于1922年10月,也就是说,《补天》几乎是与《呐喊》集中其他现实题材小说同时创作的。《彷徨》写作于1924年2月至1925年11月,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就在《彷徨》出版后不久,1926年12月,鲁迅写作了《奔月》,发表于1927年1月25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据《鲁迅日记》载,《铸剑》完稿于1927年4月3日,最初发表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八、九期。也就是说,《补天》《奔月》《铸剑》,正与鲁迅写作《呐喊》

《彷徨》的时间相始终。

《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写于1934至1935年,是《故事新编》后期作品。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回溯了写作《补天》时的想法,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sup>[4]</sup>。这也再次证明,女娲、羿、黑衣人与《呐喊》《彷徨》中的祥林嫂、涓生、子君们一样,都在承受着庸众们的观看与绞杀。只不过,那些上古神话与历史中的英雄人物,都在史籍或传说中有或详或略的记载,鲁迅在“故”事“新”编时,采取大体的框架不违史实,而细节处多有添加的办法。依据史实与虚构的比例不同,也就构成了鲁迅在《序言》中总结的历史小说的两种写法。但鲁迅之“新编”并未颠覆历史,历史人物的结局都未超出原有史籍的记载,小说反映的历史事实与小说采取的现在时态叙事叠加在一起,构成了特殊的时态——追忆着的现在时。

追忆着的现在时在文本内部营造了这样的氛围:文本所讲述的是一个已知的事件,对写作者来说,是对过去的追忆;对读者来说,所写的事件有一个可预知的结果。这使得历史小说即便是用现在时态叙述,也仍然是一个回忆的文本。在小说的叙事时间里,故事是现在的,而围绕着文本的阅读与体验,则是历史的。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鲁迅创造性地使用了貌似“油滑”的手法,将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人事,穿越进“故事新编”,对历史进行反思、批判,甚至嘲讽,这些都与他对现实的思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间表现方式的特殊性,使《故事新编》产生了历史与现实间的迷离效果。

这种时间表现的特殊效果,体现了鲜明的现实指向。出于重评传统的目的,鲁迅的《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sup>[5]</sup>,取材于民族源起时代的神话与历史。鲁迅预设的《故事新编》阅读者,也应当与作者一样有着浓浓的现实情怀,有着冲决封建文化道德的勇气与力量,对历史有着眷恋中的叛逃,清醒的历史认识和对封建传统的理性批判。这样,才能体味出禹被俗境包围的无奈,羿被群小暗伤的悲凉,伯夷叔齐被自我律条所困的可悲,黑衣人被黑暗吞没的壮烈,老子被末世驱逐的

惶惑，女娲被不屑子孙污蔑的可叹，庄子被自设的矛盾所难，和墨子被无义之徒所伤的无可如之叹，以及所有这些历史叙述背后隐藏的作者情怀。历史人物的困境正是现实困境的写照，正是作者在现实中挣扎奋斗的历史中间物。

其他取材于历史的现代历史小说，在历史时代的选择上同样带有浓厚的现实意味。李拓之《投暮》中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既是杜甫身处的天宝年间，又分明是20世纪40年代的苦难中国。明清易代之际充满民族气节的惨烈悲壮往事，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危亡的关头，重新被作家用记忆之镜映照出来，于是涌现了《新桃花扇》《瞿式耜之死》《毁灭》《斗争》等优秀作品。作家们写的是古代故事，却通过“现在时态”将历史故事转换为现实生活。现在时的叙述方式，把小说所择取的那段历史凝结放大为一个现实的舞台，将人物在历史空间的活动平面化，把人物从“公共经验、群体意识”<sup>[6]</sup>中释放出来，投入私人空间，以主体经验达成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历史小说打破了演义历史模式后，历史不再是兴亡的隐喻，而是以各种不同的诗意方式传达历史感，营造出新的与现实相联结的历史氛围。这种历史氛围大大不同于旧历史小说的道德说教，它空前灵动自由，既拥抱历史真实，又紧连现实关怀，将现代人的热力贯注于黄纸页中。现代历史小说亦藉由叙事的主体化，进一步拓展了表现视野，不再全是帝王将相或草莽英雄的业绩述说，而是关注到人生的最深层面。现代历史小说表现的分明是五四新文学的主题：是生的苦闷，人的觉醒，情爱的大胆真挚，人生意义的不停追求，自由本性的寻寻觅觅，直面人生困境的生死抉择，除旧布新和开拓历史的勇气，打破精神文化枷锁的毅然前行。历史英雄人物面对特殊的历史情境如何选择，怎样选择，他们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如何，其实都是现代作家们对历史记载的现实生发。在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背后，其实皆站着一位活的作家的灵魂，正是这个现代灵魂演绎着生动的历史氛围。

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现代历史小说，它正处于一个文体的草创期，脱离了讲史演义的旧套子，随

着整个现代文学的转型而转型，逐步发展、成熟为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现代历史小说文体。它不同于外国文学中的历史小说，更多地扎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沃土，以千年古国特有的史传传统为依托，实现了由史向诗的升华。也就是说，现代历史小说的诗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厚重之美，二是现代的叙事转换。用现代的叙事手法，去追述历史的缤纷落英，由此产生现代历史小说的诗意。它打破了演义历史的古典“史诗性”，从此，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开始力图以历史进化理性来重新阐释历史，将纷繁复杂的史事纳入理性框架，旧史旧事终于离开了天命天道，写出无穷新意。叛逆者、创造者与寂寞的战士现身于鲁迅的《补天》《奔月》《铸剑》，零余者的哀哀柔肠宛转于郁达夫的《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夜》，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充斥于施蛰存的《将军底头》，存在主义的人生意义追索贯注于冯至的《伍子胥》中，在人性的深入开掘、社会文化的批判中营构了相当成功的诗学审美意境。

然而，在这些精致诗意的短篇佳构里，西方历史观念从马克思主义史观、到旧式机械进化史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存在主义，林林总总杂样纷呈，同时涌入，每个作家笔下都根据自有的理念形成他心目中的历史。一种总体的“史诗性”难以生成，这使得现代历史小说多偏于一隅的个性化理解，格局狭窄，体式短小，多为短篇。旧的天命史观打破了，新的历史观念却杂语喧哗，涌动不安，整体权威性的历史观念尚未树立，将史事纳入理性框架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说法。不过这种未定一尊、百家争鸣的局面，倒也替现代历史小说保留了广阔的诗性想象空间。同时也告诉我们，主流话语历史叙事的历史观亟待被规范、引导和予以正向确立。

## 二 总体性史诗下叙事主体的自觉选择

从现代历史小说灵动的诗意，演进为厚重宏大的“史诗性”，尚有待于历史小说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学习借鉴。“‘史传’传统使‘新小说’家热衷于把小说写成‘社会史’”<sup>[7]</sup>，秉笔实录社会现实。

现代文学的现实题材小说中出现了全方位表现时代生活，几近史诗的《子夜》等诸多长篇。在现代历史小说呈现出多元史观与诗意化的同时，反倒是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完成了总体性史诗的塑形。当代文学中《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三家巷》等一大批革命历史小说继承了《子夜》的史诗性。在传统历史题材领域，姚雪垠《李自成》的出现，确立了通过历史叙事来表现历史客观规律的史诗模式，历史小说终于从现在时态的诗意短篇，演变为通过进化的历史线性时间展开，铺衍成客观表现历史进程的多卷本史诗长篇。现代历史小说混沌驳杂的历史感，进一步澄澈为历史规律的探寻与历史理性的生成。

从《李自成》起，当代历史小说进入了长篇时代，史诗巨著成为当代历史小说的一致追求。毛泽东认为：“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sup>[8]</sup>他因而鼓励并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姚雪垠自觉地把“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sup>[9]</sup>当作创作目标，认为“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要在“相当准确地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再现历史生活，反映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和重大问题的真正意义”<sup>[10]</sup>。《李自成》的创作，同革命历史小说一样，首先依靠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念指导，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抓住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诸多问题，通过丰厚的历史积累，终于以350万字的宏伟规模，完成了真正的“封建社会后期一部百科全书”<sup>[11]</sup>。《李自成》在将历史小说这一文体推进为长篇的同时，也在反映历史本质规律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营构总体性史诗方面，与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子夜》可谓双璧生辉。

继承革命历史叙事的英雄史诗传统，《李自成》中的李自成等农民领袖具有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关怀苍生社稷，投身于替穷苦人民争取幸福自由的斗争中，虽九死其犹未悔，具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小说从商洛南原大战写起，将李自成置放在

革命低潮的严酷考验中，展现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农民领袖所具备的特质：临危不惧、深明大义、机智沉着，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倔强的个性和不屈的精神，全力推动新的革命高潮。李自成的形象感人至深，小说更是借主人公的命运写出历史的必然性，悲剧的不可避免，现实关怀与历史悲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英雄悲剧与社会历史悲剧的完美结合。虽然小说一定程度上存在某些理念化的缺点，对农民起义领袖进行拔高描写，以至于出现“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尚神仙太神”<sup>[12]</sup>的讥评。但考之史实，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籍没富室，赈济贫民，大顺政权民心归依，所向披靡，直捣北京，覆灭明朝，确为豪杰之士。高夫人则在李自成死后，率领余部与南明政权联合，坚持抗清长达十八年之久。上述讥评失之草率。特别是小说在描写李自成后期走上灭亡的悲剧命运时，亦能深刻揭示出农民起义内在的阶级局限，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反思民族政治历史，从而达到对历史规律的整体性把握。

《李自成》开创的总体性史诗传统得到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篇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爆发性繁荣。《金瓯缺》《星星草》《风萧萧》《九月菊》《庚子风云》《天国恨》等长篇历史小说，一方面从“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sup>[13]</sup>这一重要论断出发，为农民起义翻案，“肯定其正义的正确的一面”<sup>[14]</sup>。另一方面，又“把情感指向和主体价值追寻活动定位在对封建主义思想，尤其是作为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思想的政治批判上”<sup>[15]</sup>。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深刻的社会哲理解读，成为当时长篇历史题材创作的主要风格。作品努力追求反映生活的历史广度与深度，在总体性史诗的格局中呈现出人性化的努力。只是小说常在封建统治者与农民起义领袖之间人为建立起二元对立的正邪模式，以致对封建社会及其历史文化的反思很难进一步深入。这表明，对农民起义历史的文学书写，也不能过于以规律替代主观能动性，以本质压倒多元丰富性，历史叙事在对唯物史观的活理解读上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随着历史反思的深入，凌力的《少年天子》、

唐浩明的《曾国藩》、孙皓辉的《大秦帝国》、熊召政的《张居正》、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一批历史小说，完成了当代历史小说从农民起义到帝王叙事的转向，在使当代历史小说保持史诗质地的同时，用“以写人为中心”的文学性，补充、深化，并丰富了历史规律与历史理性。历史叙事的主体化，推动总体性史诗模式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其说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帝王将相的叙事主体变化，是历史的翻转，不如说历史小说通过叙事主体的自觉选择，进一步确立写人为中心的法则，将历史规律与本质的呈现还原到文学的层面，通过历史感性与历史理性的有机融合，营构了一个多元立体、磅礴大气的总体性史诗。凌力自述“百年辉煌”系列的最初写作对象是康熙，但在检索史料、体悟史料并进行写作的过程中，从康熙变成了顺治，“百年辉煌”系列的写作与出版顺序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一写作计划的改变，是因为作家被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闭的传统意识压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少年天子》中的福临、庄太后等人，像是我自认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sup>[16]</sup>。写皇帝不写天命神聪，不写文治武功，而是写一个失败的皇帝，“把‘神’还原为‘人’”<sup>[17]</sup>，这体现了作家对“文学是人学”更为深入的体悟。《少年天子》没有简单回到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老套中，而是通过顺治皇帝的命运、奋斗和成败，“力图反映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和特征”<sup>[18]</sup>。否则，仅仅从农民起义到帝王对象转换，依然改变不了人物仍然是“历史规律的不自觉的工具”<sup>[19]</sup>的反映论模式。当写作历史小说不仅仅为某种历史观念、或历史规律所驱动，同时也为“命运”所吸引，着力刻画人性时，围绕着少年天子福临的一系列命运悲剧才成为激荡人心，令人感喟不已的“人”的悲剧，历史小说才能实现文学与历史的交融，站在历史诗学的高度，重新把握并展现深刻的历史规律和具备反思品质的历史理性。

《张居正》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既倒，在改革中排除种种干扰，历经艰难险阻的过程。张居正身上寄托着主流文化与精英作家共同

的心理原型——对推动改革的精英人格的向往与追求。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本来就有帝王将相描写的传统。借鉴革命历史叙事对人民作用的强调，汲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对小历史小人物的关注，和对历史细节与历史情境的丰富与完善等文学经验，传统历史小说中的帝王将相题材，其实早就冲破了原来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通过大文化、大历史观的建构，避免了解构主义的精神缺憾。明君或贤相的身上，凝聚的是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张居正不避物议，外拒清流，是对传统文化中自标清高、空疏无用的纠正；其务实耐烦的精神又是对好高骛远式激进改革的纠偏。正因此，万历新政才成为明王朝的一剂救命良方，使它的气脉又延续多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sup>[20]</sup>，改革是一个触动既有阶层利益，除旧布新风雷激荡的过程，过程中必然充满了历史道德与历史理性之间辩证纠葛的复杂矛盾关系。小说直面改革者自身的弱点，张居正的物质贪欲是与他任事揽事的个人强权主义分不开的。铁腕人物才能推动社会改革的巨轮，而强权主义又埋下了改革失败的潜因。与此相似，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等历史人物在唐浩明的笔下也呈现出同情与批判的交织，人物心灵、性格的复杂性冲破了作家们“以史为鉴”的主观意图，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也变得空前复杂，尤其是当这些小说所描写的历史时空与当下的改革开放与盛世语境相呼应时，重振传统文化的急切需求与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难分难解，从而呈现出格外复杂斑驳又丰赡厚重的审美质地。

从总体性史诗出发考察，当代历史小说从农民起义到帝王将相的叙事转向，于中贯注了历史时空与当下时空的感应呼求，对史事、人物、文化传统的多角度思考，其共通性大于差异性。当代历史长篇重构明君圣主模式，既有由于历史表现内容的限制而大写权谋、专制的一方面，同时更有现代理性的深入反思，能“超越局部的、暂时的正义与非正义，文明与野蛮的判断，把握住了历史运行的精神”<sup>[21]</sup>，使服务于总体性史诗塑造的当代历史小说富于思考的张力，历史叙事的主体化与历史理性相辅相成，彼此促动，互为依傍。

### 三 多重主体的自我代入 与历史真实的再生

在网络小说出现之前,新历史小说已然颠覆了传统的总体性史诗模式。但新历史小说仅习得《故事新编》跳脱诗意的表象,而缺乏对历史传统的尊重与体悟,更遑论严肃的反思、批判与扬弃。标榜“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sup>[22]</sup>,实则“在‘历史即文本’的游戏中解构有余,建构不足,背离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sup>[23]</sup>的唯物史观。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英雄的刻意回避与故意矮化,其对虚构出来的所谓小人物历史的描写恰恰是反历史的,历史叙事亦由此堕入虚无主义的泥淖。其后,解构历史、戏说历史以多元化的名义貌似繁荣,实则停滞不前。众声喧哗之下,没有一种历史叙事可以成为主流。事实上,要在庞大的历史中让从来沉默的小人物发声,而又不违历史真实,不陷入主观想象,还有待历史叙事主体的重新开掘。

进入网络文学空间的历史叙事,吸纳了从传统演义、现代诗性历史短篇、主流长篇史诗、到新历史小说等所有历史叙事的因子,融汇成为自己独特的历史叙事,既有架空历史的天马行空,又有“戏说”“大话”“水煮”等故事化手法,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甚至有人认为“穿越”已经上升为网络文学的一种“元叙事”,是“网络题材或类型小说中都普遍存在的叙事元素或设定。把‘穿越’作为一种叙事方法,或许能更全面的把握和理解网络文学中存在‘穿越’这一普遍的现象”<sup>[24]</sup>。也有研究者认为,“‘穿越’只是一种展开故事的手法”<sup>[25]</sup>。尽管穿越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在诸多网络类型小说中现身,但它以“今穿古”“古穿今”“快穿”“反穿”等多种穿越方式构造古今杂揉的历史叙事时空,确乎构成了网络历史叙事的一种重要类型,呈现出许多共同的固定特征。“穿越小说将故事依附于某一时空虚境中,展现穿越者的自由发展,它们描绘的传奇,集中于差异巨大的等级制下‘人’的‘成功’”<sup>[26]</sup>,在穿越小说中“现代观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往往对峙并存,以此维持叙事的张力”<sup>[27]</sup>。迄今为止,穿越历史

叙事的主体化最强,它“以代入式见长,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和与当下共享的价值观念”<sup>[28]</sup>。

与其它网络类型小说一样,历史穿越小说分为“男性向”与“女性向”两大类型。女性向的历史穿越以现代女性穿越回古代,其历史朝代的选择多为盛世,尤以清朝居多,甚至形成了专门的“清穿”类型,以《梦回大清》《步步惊心》《瑶华》“清穿三座大山”为代表。这些现代女性穿回清朝后,大多进入宫廷,在知晓历史走向与结局的情况下,与王孙公子们铺展开一段以女主为中心的爱情故事,在“不问来路,不求归去”<sup>[29]</sup>的模式下满足于历史繁华的物化表象。男性向的历史穿越则以现代男性穿越回古代,其中历史朝代的选择往往是中国历史改革与转型的关键节点,如《新宋》《宰执天下》(王安石变法)、《异时空——中华再起》(近现代)、《回到明朝当王爷》(明朝)、《商业三国》(三国)等。这无疑源自中国近代史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屈辱的历史情结驱动,穿越历史试图重构历史,将现代科学与民主直接前挪,置于宋、明、清等变革时代,从而获得一个强大的中国,甚至有建立中华殖民圈的历史想象,“为重新寻找当代中国的位置和道路提供历史资源”<sup>[30]</sup>。

无论哪种方式的历史穿越,内容、目的、朝代均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满足“蚁族白日梦”这点上却并无二致。只不过女性向历史穿越小说并无男性向那种改天换地的野心,仅满足于在历史框架中满足私人性的爱情想象,以参与、旁观历史的方式实现历史叙事的主体化。男性向历史穿越小说则有着更为积极的“改造”主体,但在主人公通过穿越,使“现代”遭遇“历史”的过程中,现代性的前置与强国梦的实现,似乎以想象的方式变得过于轻易;而且按其设想,强大之后中国的发展途径也并未跳出前现代的历史惯性思维模式,同样陷入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实现现代性的悖论。在挥斥方遒、改天换地的快意想象中,历史穿越小说藉由通俗化的主体,依然滑入了能指的游戏。

正是不满于大部分历史穿越小说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简单化,一旦穿越便在历史空间大开“金手指”的缺陷,2006年,在SC论坛(sonicbbs)军事架空版上,网友独孤求婚发起了一个讨论:“如

果我们携带大量现代物资穿越到了明末，会怎么活下去并改变历史？”这个讨论吸引了一大批参与者，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形成了跑团文《天变——崇祯二年》，诞生了最早的一批同人文章。被称为“临高三屠”的三部作品随之先后出现，它们是：陆双鹤的《迷失在一六二九》（2008年至今，起点中文网）、石斑鱼的《一六二二》（2009年至今，起点中文网）、吹牛者的《临高启明》（2009年至今，起点中文网）。其中，《迷失在一六二九》因价值观与网友冲突，被跑团网友们弃书，变为个人创作后很快失去影响力。《临高启明》的执笔者吹牛者汲取了教训，对网友们的合理化建议能够虚心接受，特别是从“女仆革命”开始，《临高启明》变成了真正的“众筹写作”。女仆革命这一情节本身源自网友们激烈的争论，“起因、发展和结果，也包括里面的解决方案，全部来自读者的讨论”<sup>[31]</sup>。吹牛者将网友们在论坛讨论的帖子，稍作加工就写到书里，极大地增强了网友的角色认同，也使穿越历史的五百众分别被两三百位网友认领，除文德嗣、马督公（马前卒）、独孤求婚、萧主任（即吹牛者本人）等主要角色外，又新加入诸多龙套众人，同人文也不断涌现。吹牛者实际转变为一位执笔者，从网友们提供的素材和同人文中汲取营养，不断补充、丰富小说的情节。由此，网络众筹写作的历史穿越小说《临高启明》变成了几百位有血有肉，有自己独立个性和想法的多重主体，小说也变成了真正的多线程、无主体结构。众筹写作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模式，几乎每个小说角色的背后，都有一位真实的网友，不但提供专业知识来支撑相关行业的写作，同时提供着真正的性格主体。其坏处也显而易见：支线太多，人物的出场顺序有时被拉得太长，文风不够统一，网友们也可能因为观点不合而退出写作，导致某条支线烂尾比如，张应宸的退出使小说中的重要支线“新道教”难以为继。然而，这也可能是网络时代历史叙事多重主体化的原生状态。

《临高启明》于2009年6月6日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篇幅已达750万余字，最新章节为第七卷第二百六十六节，更新于2020年7月2日，至今尚未完结。还有超过千万字的同人创作，是《临

高启明》正文创作源源不断的蓄水池。实体书《临高启明》第一卷于2017年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第二卷据“临高启明”公众号6月27日推文预计将在年内问世。小说描写“临高五百废”共同穿越到明末临高县，依靠穿越前准备的物资，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建立工业化强国的故事。最初的跑团成员大多为理工科背景，仅穿越虫洞前的物资准备就写了47章，诸如工业上“三酸两碱”的制备，船只枪炮的建设等都有严谨而专业的细节支撑，《临高启明》由此被读者称为“硬核穿越”“穿越第一神书”“工业文明简史”“各行业百科全书”等。五百众建设与扩张的过程，真实地再现了工业化的历史，也呈现了“工业党”的价值观。而随着政治法律体系、商业与财政、金融与贸易、货币的制造流通、刑侦、卫生、教育、宣传等相关体系的逐渐建立，小说超越了工业党，在文、理、工融合的视野中，复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更对过往历史作出了主体化纠偏的尝试。在《临高启明》的穿越时空里，真正实现了“历史是人民群众缔造的”，穿越将历史变成了一场集体参与的游戏，穿越众人置身于器物、服饰、科技、思想等真实细节营造出来的虚拟历史空间中，完成主体想象性的建设。在这场近乎狂欢的游戏里，“历史元素的背景作用变成了历史体验的游戏场，历史江湖的英雄主义变成了个人的情感叙事。从而，网络穿越小说以最‘非我’（时空、身份的彻底变幻）的方式表达了最‘真我’（抛却一切现实社会角色的束缚与局限而呈现出最真实、最纯粹的自我）的状态，满足了网络文学的写者和读者宣泄情感、实现理想自我的需求”<sup>[32]</sup>。

《临高启明》的主体真实性首先体现在“临高五百废”的人性真实，穿越者们“各怀鬼胎”。起点中文网《临高启明》的作品信息这样写道：

穿越到乱世不是被雷劈，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有人想称王制霸，有人想解民于倒悬，有人想以己之力，阻止最后一次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从而改写中华民族的历史。

当然也有人想得只是三妻四妾，过现世过不上的极度腐败的生活。

这群三心二意，各怀抱负的普通人，没有虎躯、没有王八之气更没有弱智光环道具。乱哄哄的挤在一艘旧船上，有的只是现代机器、科技还有各式各样的理论。穿越者们怀着现世无法达成的野心、梦想和理想，向着明末的乱世进发。

目标：海南。<sup>[33]</sup>

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真实的自私、虚伪、狡诈、胆怯，有矛盾有争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也坚持人性的底线。起点编辑在《写手成神之路》一文中曾说过，“一部好的YY作品，首先得是一部代入感很强的作品，只有读者把主角当成自己”，“作品中YY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最大的快感”<sup>[34]</sup>。《临高启明》的主体甚至都不需要代入，“他们”就是“我们”，任何一位对小说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选择角色写作同人，从而有可能进入小说的正式写作，成为《临高启明》的创作主体之一。

主体的真实就使历史的真实获得了呈现吗？并非如此。小说通过“女仆革命”选择了希腊式民主政体，元老院和执委会的架构使穿越众高高凌驾于明朝土著之上，超越于法律之上，甚至刻意营造元老是神的幻相。穿越元老们建设工业的同时，也对土著们的小手工业生产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间传统与现代，大工业与小生产，经济、体制与道德、精神的冲突通过多重穿越主体的亲身介入性书写，反思中也是“乱象丛生”。多重主体的自我代入，一方面使《临高启明》不开“金手指”，老老实实写出现代工业强国一步一个脚印的建设史，竭尽全力想使穿越的历史变得“真实”可信，也确实给读者提供了回顾历史的阅读效果；但另一方面，在庞大乃至庞杂的结构中，《临高启明》所“创造”的历史，却仍躲不过缺乏想象力的历史“复制”，穿越众的众声喧哗和多元话语，是否就能更加真实地表现历史和反思历史呢？对于穿越小说内置的真实还原历史、反思历史的写作意图和初衷，小说在其看似颇有创举的众筹写作中未必都得到了实现。

互联时代历史叙事的主体化，《临高启明》不是起点，亦不会是终点。被复制的历史以多样的姿

态出现在穿越小说的互文性文本中，“‘复制’（如果可以用复制这个术语的话）导致了另一种可能：虚拟现实是人们虚幻的想象之物，与真实的现实终究有所区别，这些想象之物激发游戏与发现，构成了想象的一个新层次。虚拟现实将人置于另类世界‘之内’”<sup>[35]</sup>。穿越主体在虚拟的历史时空里参与价值、意义的创造，“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亲身参与到对历史的改造中”，“历史的幻象就是现实的倒影，甚至是未来的方向。用现实建构历史，在历史中想象未来，在这里，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已近乎一体”<sup>[36]</sup>，营造了一种“完全共时”的历史空间，由此“揭示出过去、现在、将来一切事物的真正意义”<sup>[37]</sup>。在穿越型历史叙事这个集体性交互平台上，“每一个私人参与者都充满公众式责任感和神圣感，参与一个伟大或有趣的社会生活实践，从而使自己的感受、体验、忧伤或愤懑公共化为各种各样的经验与教训”<sup>[38]</sup>，这体现了众人合力面对历史、书写历史的热望。但是，仍在书写、正在生长的《临高启明》，虽有矫网络历史穿越小说虚无游戏之偏的愿望，却是想以历史叙事的多重主体，实现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的甦生，这种看似全新的、“复数的”“总体性史诗”，真的能达成“总体性史诗”的写作目的吗？依笔者看，未必。其间的并不能真正还原历史、甚至是更加远离了真实历史等问题和弊端，也显而易见。但凡此种种，都为未来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可资参鉴和反思的参照，以及重构与建构主流话语历史叙事的契机。

[1]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第34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 鲁迅：《补天》，《故事新编》，第1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

[3] 鲁迅：《铸剑》，《故事新编》，第93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

[4] 鲁迅：《序言》，《故事新编》，第1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

[5] 鲁迅：《〈自选集〉自序》，1932年12月14日，《南腔北调集》征求意见稿本，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6] 葛红兵：《“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



- [7]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9] 姚雪垠:《给江晓天同志(二)》,1974年9月26日,参见本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11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 [10] 姚雪垠:《前言》,《李自成》第一卷上册,第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 [11] 姚雪垠:《关于创作〈李自成〉的艺术追求和探索》,《华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 [12] 方守金:《〈李自成〉新论》,见刘起林编:《文学“马拉松”:〈李自成〉出版五十年研究文选》,第40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
- [13] 恩格斯:《1883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纪念版),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第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 [14] 吴晗:《再谈历史剧》,见《戏剧报》编辑部编:《历史剧论集》第一集,第2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 [15] 吴秀明:《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历史叙事与本体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 [16][18] 凌力:《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的创作反思》,《少年天子》,第563页,第56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 [17] 缪俊杰:《百年痛史 一曲悲歌——评凌力的长篇系列〈百年辉煌〉》,《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
- [19][21] 雷达:《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少年天子〉沉思录》,《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 [20] 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1期。
- [22]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23] 江泽民:《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1998年9月25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 [24][27] 张瑶瑶:《“穿越”:作为一种讲故事的方法——网络文学中的穿越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第11页,第24页,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7年。
- [25] 黎杨全:《网络穿越小说:谱系、YY与思想悖论》,《文艺研究》2013年第12期。
- [26] 粟斌:《“传统”的魅惑——兼议网络穿越小说出现的时代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 [28] 刘迪:《“异托邦”的想象——网络穿越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3年。
- [29] 邵燕君:《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第1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30][36] 吉云飞:《“穿越救亡流”与“历史研究范”——历史穿越小说如何对话历史》,《文学报》2016年10月13日,第4版。
- [31] 吹牛者:《〈临高启明〉与互联网时代的写作·下》(2017年5月27日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座文字整理稿),2017年8月4日,“临高启明”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U0NzkzMg%3D%3D&idx=1&mid=2458535996&sn=7900372f793c0721e0a0804c26a7a897](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U0NzkzMg%3D%3D&idx=1&mid=2458535996&sn=7900372f793c0721e0a0804c26a7a897),引用日期2019年5月4日。
- [32] 李玉萍:《论历史元素在网络穿越小说中的运用》,《小说评论》2009年第S2期。
- [33] 吹牛者:《临高启明》作品信息,2009年6月6日,起点中文网,<https://book.qidian.com/info/1262627>,引用日期2020年4月25日。
- [34] 起点编辑部:《写手成神之路》,原刊时间不详,转引自“YY书屋”:《新人作者成神之路》(起点编辑部的教材),转载日期2008年10月6日,<http://bbs.yys5.com/thread-24375-1-1.html>,引用日期2019年5月4日。
- [35]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第4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37]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第35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38] 何学威、蓝爱国:《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第26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艳